王蒙先生侧影

韦 泱

这回在北京见王蒙先生，真正是在他左右两侧，面对的多为他的侧影。

那天，跟着上官消波的车，去王蒙家拍摄。这是上海新闻出版博物馆“文化人书房”的一个摄制项目。按约定的时间，我们早早来到京郊上庄村。第一个细节就让我们怦然心动。车抵王蒙家门前，准备揿门铃时，忽见门并没关紧，只是虚掩着。慢慢推开，在内门敲了几下，但见王蒙快步走出，连说“进进”，又说“近年耳背了，怕听不见门铃让你们久等，门就不锁了。这叫门户开放吧”。我们会心笑道“让您费心了”。

这样轻松的聊谈，解除了我们的拘谨。王蒙领我们上了二楼，说“这里是我的书房。架上的这排书是近年出的”。这正中上官下怀，赶紧说“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拍摄效果，在您的书房，以您的书为背景”。王蒙的专著包括小说、散文、评论、自传等，有一百多种。这不，书架上列着刚出版的四十五卷《王蒙文集》。临窗的右边，阳光铺洒进来，十分柔和。对摄影来说，是最佳光线。我站在王蒙左侧，帮着上官打辅助灯光。“咔嚓、咔嚓”，上官干脆利索按快门，王蒙站立的半身肖像就拍好了。

接着，转到三楼，又一个细节让我们心生感动。王蒙一边走，一边提醒我们，说“当心头，小心碰着”。这才抬头观看，这里已是顶层，呈三角形，几间屋子都是中间高旁边低。进了一间大屋，里面套着内屋。王蒙说“这里乱得像书库，没时间整理”。我们一看，还行，书都一排排码得蛮整齐。这应该是他的藏书了，应有尽有。王蒙指着窗台边一摞书说：“这些都是我的外文版作品集，这是韩国出版的书”。上官赶紧说“太好了”，就把这摞书全抱过来，就在门内一边放定。这些书中有英、法、德、日、俄等，如果全的话，王蒙的作品被译成过二十多种文字在国外发行呢！上官请王蒙坐在两间屋子中间的木门槛上。我一看，立马领会了上官的拍摄意图。从里间往外间拍，两个屋子的书统统摄入了他的镜头。

拍了两张，王蒙忽然说：“慢，我去换件衣服。”很快他就把中式布扣外套换成了无袖拉链小夹衫，他说：“这件我挺喜欢的，来一张。”果然，又是一种新形象。

难得去一次京城，也难得见到王蒙先生，总得留个念想。之前趁着周六去了一趟潘家园。在一旧书地摊上，赫然瞥见王蒙所著《不成样子的怀念》。十多年前定价二十多元的书，且品相甚好，只花五元就到手了。此书写的多是王蒙结识的文坛前辈周扬、夏衍、丁玲、冯牧，也有他的同辈文友如宗璞、张洁、冯骥才等人。拍摄结束，我取出该书，请王蒙签名，他大笔一挥，题写道：“韦泱先生赐阅，王蒙二〇一九，十一月，北京翠湖别墅”。我赶紧谢过，然后道别。看他疲惫地想站起来送我们，又连忙按住他，说“王老请留步”，他礼貌地说“那我坐着先歇歇”，并关照他的年轻司机送我们下楼。

一位八十六岁的文化老人，被我们折腾了近一个小时，确实够累的。他没有一点名人做派，谦逊，随和，在拍摄过程中，听任摆布，配合得尽善尽美。这都使我们深怀敬意，也由衷地铭感在心。在这幢楼的上上下下，上官所拍摄的大多是王蒙先生的正面形象。而我想，他有那么丰富的传奇经历，有立体多彩的人生，还有生活中的细枝蔓叶，细语微言，这何其真实而又生动。

我写下这些零星的文字，就算是他的一个侧影吧。

工人的天空

管新生

一不小心，已是人到黄昏。

在似水年华的人生沙滩上，捡拾着一枚一枚又一枚小小的贝壳。每时每刻，都会有惊喜，都会有发现，都会有疼和爱。

贝壳最终串成了一条红线，便成就了这一册小书——《工人新村：上海的另一种叙事记忆》。

其实，这是一个蛰伏心底已久的秘密。

那时，正在创作三卷本百万言的长篇小说《工人》。在查阅浩瀚如海的史料中，上海的两大城市地标渐渐升上了历史的地平线，除了前殖民时代的经典石库门，还有一类突现在我的面前是：新中国成立后建造的工人新村。

于是，多少被忽略被蚀刻的记忆和神秘就此抖落岁月风尘，穿越了时光隧道，走下了折叠的历史台阶。

我们开始遥望，那些没有来得及抖落战上海的最后一抹枪炮硝烟的军大衣，猎猎漫卷工人新村建筑工地上的第一声打夯号子……

我们开始遐想，在军用地图上指点作战的红蓝铅笔，在杨浦在普陀勾勒出了大片区域，有绿水人家绕，有小桥流水杨柳岸，还有给工人后辈们预留上升空间的大学堂……

我们开始聆听，无数位建筑专家在进行专题讨论、在精心设计工人住宅，其中还夹杂着外国专家频现域外风情的出谋划策：两层楼的“两万户”，三层尖顶的小楼，宽敞的公用空间，木质地板，自来水，抽水马桶……

我们开始沉思，新中国的缔造者是以怎样的大手笔大睿智大考量为工人阶级描画第一代工人新村的蓝图……

至今长相忆，工人们在享受现代化福利的同时，蓦然在时处近郊的工人新村走进了唐诗宋词的画面：三五蝉影卧绿荫，七八蛙鼓叩池塘；试问谁家小猫咪，乱花丛中扑粉蝶……

呵，工人新村！一瞬间有多少情感多少欢乐多少百姓心事，被这四个字牵着扯着扑腾着，一同飞奔而来齐刷刷亮相。

八方书谭

陡然，一个大命题轰轰然在我的面前跃起：写一写我的工人新村吧，不，写一写我们的工人新村！原本，心底蕴藏着太多太多的工人新村的情结——我的故事你的故事他的故事，我的同学你的同学他的同学，我的邻居你的邻居他的邻居，一样的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的小船儿荡起双桨，一样的“红旗下的蛋”。

有一种机遇，叫作缘。

有一种必然，常常不经意地隐匿于偶然的翅翼下。

《工人新村：上海的另一种叙事记忆》，就这样诞生降临，来到了人世间。

曾记否，半两的上海粮票，几尺几寸的上海布票，鱼票肉票豆制品票，生产劳动光荣飞马前门牡丹香烟票，逢年过节增加的鸡鸭豆油糖果瓜子花生……凭票供应的疆域辽阔，甚至结婚时必备的“四大件”——上海牌手表、飞人牌蝴蝶牌缝纫机、三五牌台钟、永久牌凤凰牌自行车，“36只脚”的家具，均名列其中……

点点滴滴，在一千种记忆中诉说记忆的青春。

自在草绿色稿笺上写下了第一行文字以后，身后便仿佛有了一道无形的鞭影，命中注定似的在时时抽打着呼啸着逼迫着，让我这个“工人新村的子弟”再也无法停下叙述的笔尖。

是的，火车已经开动，已经开出了月台，又岂可随意停车？

《工人新村：上海的另一种叙事记忆》的操练，让我从岁月的长河中打捞记忆，让我重新走了一回童年之路少年之路青年之路，直教往事飞涌眼前，点点滴滴魂牵梦萦……

这是原汁原味的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拙著曾在杂志上连载，不断收到读者来信来电，除了个别熟识者，大多素昧平生，均认为写出了他们生命中曾经的那些故事那些精彩那些情结。不知，这是否可视为一种共鸣或褒奖？

付梓之际，正值新中国七十华诞，谨以本书化作一朵绽放的小花、一声热烈的欢呼。毕竟，体现1949年以后工人阶级成为了社会主流的工人新村，于今已作为上海的城市地标而永载史册。

本文为《工人新村：上海的另一种叙事记忆》（中国工人出版社）创作札记

就像一个人，在等待另一个人。村外，一棵树在等待另一棵树。

老 树

己亥杂吟

高 昌

连夜长风不肯停，吹山吹水入新屏。
醒来香草搴旗绿，植入春天一缕萌。

楼外流云曼妙姿，绝怜瑞雪欲飞时。
天公若更随人意，你放梅花我探诗。

流云稍浅月偏深，风信传来香满襟。
秘密花园围一角，留开彩色那些心。

飘然行处佳山水，摇曳相思红紫蕊。
过眼还看名士轻，关情只醉胜游美。

云端与云下

汤世杰

有道是：“情尘既尽，心镜遂明，外影何如内照？幻泡一消，性珠自朗，世瑶原是家珍。”——读明人屠隆这段话时，我正在想着这些事。

有些怀想看似寻常，一旦细究，则似总会透露出某种近乎荒诞的戏谑性——说那是喜剧性也未尝不可，当然是卓别林式的喜剧，是从灵魂深处发出来的会心之笑，或眼里噙着泪水的笑，而非当下流行的恶搞出来的，狂放却来历不明、不知究里甚至暧昧的笑。

四十多年前，当我头一次躺在云南的某座山冈上，仰望湛蓝如水的蓝天和帆一样飘移滑行的云朵时，便突发奇想：如果那时能让我的心智魂魄，回到我生长的西陵峡口长江之滨，或是我求学时待过的橘子洲头湘江岸边，那么，隔着将近两千米的高差，此刻我的肉身，已然该是在云端了吧？我的魂魄，几乎可以清晰地看见我自己，在山之上，在云之上。可明明地，我的肉身知道，我仍在云下，而非云端。

那时，作为一个身处底层的铁路养路工，我只是在劳作的间隙，有那样半个钟头的歇息。其时，我正躺在山上，躺在云下。我的身边，是我的师父和工友，是那条我必须为之挥洒汗水的铁路，它穿越群山，一直伸展到我目力不及的远方。每天将近十个钟头的强体力劳动，让我感到浑身酸痛不已——不仅肉体，还有魂灵。而我竟在那一刻，无端地想到了“云端”那样一个带有浪漫炫魅的字眼。正是那个字眼，霎时便把我带到了我无法预料的未来。直到如今，想到这里，想到那样的“想入非非”，我便只能暗暗地与自己会心一笑了——你在想什么呢？事实是我好像什么也没想，至少对于未来，我没有清晰的预测。但我知道我应该有个与那时，与那座山冈，那个时刻不一样的未来。所谓“不一样”，也并非不再做体力劳作——这世上，亿万人不就是那样度过了一生吗——而是寻思对于这个世界，我或该做点什么。就在那一刻，我似乎有了某种超越，对于“当下”，对于际遇的超越。

多少年后，无数次的，包括此刻，我都会一次次地想起那个时刻。在丽江，在香格里拉，在高黎贡山，我曾多次凝望云南的云，也在那样的凝望中想起云端这个字眼。当无论本地或外地的朋友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到、写到云南的云时，我想起的是我最初的那次对云南天空的一次茫然凝望，对云端与云下的一次莽撞思索。我自信，那样近乎原始的想象，具有它特殊的合理性，那是一次不具诗性的诗性思索，一次与哲理无缘的哲学性冥想：肉身在云下，魂魄在云端。

如此说来，云端与云下，只是两个相对人的肉身而言，有云壤之别的词语，或是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云端，是出世的，属于魂魄，属于精神，象征着高度与超越；而云下，则是入世的，属于肉身，属于度日，属于我们每天都不得不面对并深陷其中的日常与凡俗。

云端，是美丽的，是五光十色的；

云下，是琐碎的，是柴米油盐的。

一个完整且健全的人，就在云端与云下之间，来往穿复。我们无法拒绝日常生活的单调、沉闷、平庸与千篇一律，就像我们无法拒绝作为一个生命必然会有的吃喝拉撒睡一样。但任何一个人，如果只沉湎于生存之中，就成了一个纯粹生物性的人。不时地，他需要去到云端，去云端溜达一下，休闲一阵，哪怕是去那里换口气也好。

其实，云端不远。云端，就在我们的目光和心思所能到达或者永远无法抵达的高度。但无论你是否能够最终抵达，那里，都能存放你的思索，你的幻想，你的秘密，甚至你那些无法得到世俗认同的爱。

有或没有那个高度，生命的存在，它的必要性、合理性，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是《娑罗馆清言》主人屠隆说得好：“饧粘油腻，牵缠最是爱河；瞎引盲移，展转投于苦海。非大雄氏，谁能救之？”“大雄氏”指佛，我等俗人，岂能常见？能“救之”者，唯我们自己。倘将“爱河”移譬为“云端”，将“苦海”转喻为“云下”，一切便能得解，也能得救了。

观念提升效率

白 丽

1984年出生的张俐珺，是唐镇卫生干部中最年轻的。假小子似的张俐珺，有着年轻人特有的对工作的热情、干劲，她在卫生工作上的效率，也是显而易见的。

6月25日分类垃圾的宣传试运行开始以来，她拿着小喇叭四处宣传呀，介绍呀。吕三村有1089户人家，100多户是本地人，900多户借给了外地租客。2015年，小张当上了卫生干事。她其实是嫁过来的，她是吕三村的媳妇。

吕三村毗邻张江，早高峰时分，上班的私家车主们，会沿路丢下不少垃圾。现在讲究“美丽庭院”，敞开式，但不确定因素很多。因为住户分散，有害垃圾与可回收垃圾都没有设点，认真的小张，在每户配有统一的垃圾桶的基础上，做到上门收集。早上在6:30到8:00，晚上6:00到7:30，每户收集。刚开始是很痛苦的，第一天，第三方开车收齐这些垃圾用了整整8个小时！小张反复踩点确认，确保收运路线不重复、不漏桶、更高效。实践磨合之后，工作效率果然提高许多。

夏日，酷暑，管好垃圾，又臭又累。混投仍然是个老问题。不少人诉苦，方式不对；不少人问询分类窍门。小张不是办公室的“官”，她总是亲临一线，早晚各一次跟着垃圾收运人员一起查看村里各户居民的垃圾分类情况，遇到分类不好的，尽可能找到当事人进行告知和宣导。在整个过程中，让小张意外的是，以为高龄老人因为没听说过垃圾分类，会不习惯新法扔垃圾了。事实上，“80岁的老奶奶是最给力的。”小张说，“一个村，三个生产队，三个保洁员；分类后，两个保洁员；人手不够啊，我的车子被他们拦下……一个星期后，终于再增派二人。那些阿姨妈妈们，熟了，会把你当朋友，什么都跟你聊，工作，生活……我们也磨合得越来越有效率。”

“这里90%以上是外地租客，他们没有归属感。我们就找他们的房东。房东都是要面子的。我们张贴红黑榜，好坏分明，挑战信誉。”“我不知道啊！我不住在这儿！”小张说，有的租客会赖皮。她马上反击：你不在这儿，怎么看见你在这儿刷牙？还有一对年轻人，说在公司随便扔垃圾，在家里也自然随便扔！

合作中建立友谊，“战斗”中智斗。这既抒情又严厉的工作，一天下来，累得回家只想“葛优躺”，两个宝贝的家庭作业监督，只能让老爸来完成了。但是孩子们会为母亲骄傲的。

较之别的小区，张俐珺十分重视垃圾桶的新旧与保洁工作。黑色是干垃圾桶，棕色是湿垃圾桶。一套280元，新的及时换下旧的，旧的卖给第三方可折现10%，冲洗垃圾桶的高压水枪也总是及时换上更便捷高效的。把桶的折旧率放在心上，注重洁具的质量同时要算好一本经济账，80后年轻人的眼光与效率果然与他们前辈的不一样。垃圾盛具的清洁美观，会影响人的心理：扔垃圾不再是一件脏事。清洁是美观的起码。

“我妈妈是检查卫生的！”家里的一对姐妹花自豪地对人说。

“我们现在的辛苦，正是为了下一代能自然地遵循规则。”——张俐珺说。

十日谈

“垃圾分类”新风尚

责编：杨晓晖

蟹壳究竟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请看明日本栏。